

纪念崔敬伯先生诞辰120周年



崔敬伯 (1897-1988):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财政学家。1927年东渡日本, 在东京大学选修财政学等课程。1930年公费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32年返回中国, 在燕京大学等校任教。1934年任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秘书、财政主任。抗战爆发后, 离北平辗转至南京、重庆, 1938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川康直接税局局长, 是所得税、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遗产税制度主要创立者之一, 1945年底任财政部直接税署副署长。1948年, 辞去财政部职务, 先后当选国立北平研究院第一届学术会议会员、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委员, 10月辞立法委员职, 应邀任湖南大学经济系教授。1949年,

被任命为国家第一任税务总局副局长, 参与创建新中国税制体系, 并在北京大学等校兼职教授财政学, 1955年起兼任中央财政干部学校(中央财经大学前身)副校长。1957年错划“右派”, 1960年第三批“右派”摘帽, 1979年正式平反。崔敬伯著述宏富, 民国时期有大量论文传世, 并有《地方财政学讲义》(1934)、《崔敬伯收集财政学类书》(1936)等书; 新中国成立后草创《中国财政史讲义》(1963)、《中国财政简史》。主要论文已辑入三卷本《崔敬伯财政文丛》(2015), 部分诗词、散文辑入《静泊: 崔敬伯纪念文集》(2005)。

收藏还包括历史、地理、文学、哲学几大类。笔者在旧书网上买到过一本崔敬伯先生1936年收集的财政类书目, 该书记载崔敬伯先生截止1936年收集的图书共600多本, 其中有400多本英文书和日文书, 200多本中文书及一些史料。1966年第一次献书时, 敬伯先生曾写过一首《菩萨蛮》:

南楼楼下经寒暑, 书城四壁明华烛。徒屋上新楼, 郊原眼底收。献书千百卷, 伴我惟经典。鹭博祗蹉跎, 研精不贵多。

文革时期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一度停办, 为了复校, 赶走烟厂, 84岁高龄的崔敬伯先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给李先念等各级领导人和北京日报等媒体写信, 写诗, 每日拄着拐杖坐在烟厂的大门口讨说法:

“寒流热浪屡相缠, 老眼苍苍不忍看。

领导频申还校舍, 新生仍叹入学难。

是谁作梗年年课? 相对枯棋步步拦。

见义勇为当力断, 北京烟厂必须关。”

崔敬伯先生90寿辰时, 由中央财经大学组织编纂的《静泊诗词选》出版了, 财政部副部长陈如龙, 教育司调研员金志高, 副院长姜明远, 党委书记陈菊铭, 副院长钱志涛、王珂敬, 以及副教授姜维社、胡中流等14人带去前往家中祝贺。

1988年5月27日崔敬伯先生因病逝世, 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原财政部部长薄一波, 张劲夫及国家教委、财政部、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中国工商联合会等送了花圈, 参加告别仪式的有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 全国政协副主席孙晓村和民建主席孙起孟, 原财政部代部长戎子和, 原财政部部长吴波, 国家科委副主任、原公安部部长阮崇武等300多位敬伯先生生前好友。

崔敬伯先生无限热爱自己的祖国, 在祖国危难时未竟学业, 毅然回国。一生淡泊名利, 两袖清风, 晚年常以静泊自称。好友历史学家范文澜称崔敬伯先生出淤泥而不染。敬伯先生在旧政府做官是想为抗战尽力, 实现一介书生的治国理想。当理想和现实差距太大, 敬伯先生还是选择做个学者, 一生中几次辞掉高官, 终其一生60年教书育人, 桃李天下。除了学者、官员的身份, 崔敬伯先生也是解放前《时事新报》、《大公报》、《重庆大公报》、《大晚报》、《新民报》、《新民晚报》、《经济评论》、《财政学报》、《新经济》、《益世报》、《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等多家知名报刊的专栏作家, 发表了大量社评、社论、杂文和诗歌。一生发表作品不完全统计1400余篇。

敬伯先生颇为欣赏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无论何种身份始终关注民生, 关注国家的发展方向, 不计个人安危得失, 敢于向高层谏言。作为民建中央委员, 九三学社委员,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顾问, 中国财政学会顾问, 中国税务学会顾问, 敬伯先生晚年依然关心国家大事, 献言献计, 举才荐才, 为中国财政事业鞠躬尽瘁, 为中国培养梯队师资和人才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于91岁时写了一首自咏诗作一生的写照:

气自沉酣志自雄, 短刀无意助功名。

拼化碧溶冰雪, 迸做摇天撼海声。

值此崔敬伯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 谨以此文和2017年12月出版的《静泊诗词荟萃》向崔敬伯先生致敬!

(作者王华: 自由撰稿人, 崔敬伯先生孙媳。)

在中国财政界, 崔敬伯先生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崔敬伯先生从1919年22岁起开始教书生涯, 一生有60年在燕京大学、北平大学、北京大学、重庆大学、湖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中央政治大学,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等十几所名校从事教学工作, 有30年在新旧政府财政高层从政经验, 上世纪30年代就是国内有重要影响力的财政专家, 是我国财政理论和财政学科重要奠基人之一、所得税种创始人之一、学贯中西实践经验丰富的财政学家, 中央财经大学前身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的学术奠基人之一、中国唯一的财政院士, 陈云, 薄一波, 李先念, 杨秀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历史学家范文澜都对崔敬伯先生的学术和人品做出过高度评价。

崔敬伯先生不仅在财政、经济领域颇有建树, 在汉学, 历史学也颇有造诣, 同时敬伯先生也是一位多产的诗人。敬伯先生于1927年留学日本东京大学, 1928年北伐成功, 同为留日好友新中学会创始人马洗凡力邀敬伯先生回国, 担任第一届河北省政府秘书(周恩来留日期间也是新中学会会员)。颇具文采的敬伯先生担任秘书期间不仅亲手撰写公文, 也曾代表省主席商震做过《省政府施政报告》, 这一时期曾有诗作《河北局面的改变》:

顺时而动, 必受其福。时至不动, 反受其殃! 得其民者, 得其心也, 勿谓世乱, 真理未亡!

1930年公费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主修财政学、政治学, 师从著名财政学家达尔顿(英国财长), 政治学家拉斯基(英国工党领袖)。1932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崔敬伯先生未竟学业, 毅然回国。这一时期曾有诗作《中夜不眠起望笼月识感》

沙场战血犹飞溅, 劫后余生倍楚酸! 隔海若闻金戈响, 彷徨不夜不成眠。

回国后在北平大学、燕京大学、朝阳学院、中法大学、中国大学任教, 并于1934年进入北平研究院任秘书及研究员, 1935年任财政系主任, 开创了我国财政学科的高等专门研究(北平研究院建国后与中央研究院合并成中国科学院, 1977年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科部基础上组建了目前的社会科学院)。1935年至1936年, 崔敬伯先生除了学术研究, 同时活跃于北平的学生运动, 如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北平文化界救国会, 华北文化界救国会。崔敬伯先生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一周以北平研究院唯一代表、国内唯一财政专家身份参加了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一期社会各界学术名流云集的庐山谈话会, 并做抗战主题发言。1938年至1945年, 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川康直接税局局长, 协助创办了所得税、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和遗产税, 1938年参与起草了中国第一部《所得税法》, 任职期间, 提出直接税“四风”, 即学术之风, 重研究; 家庭之风, 重亲爱; 军队之风, 重纪律; 宗教之风, 重信仰。川康办税八年, 为政清廉。抗战期间, 政府公务员工资极低, 生活困苦, 而手握重权的政府高官们, 大发国难财的比比皆是。学者崔敬伯先生执政是一股清流。他曾经的下属周郁曾对文革外调人员说: “崔先生公家经费之支出, 掷地可铮铮有声, 非今世税人所能易见者” 敬伯先生也曾经作诗一首《八年感悟》:

川康办税八年, 归来两袖清风; 只知抗战为国, 死生一任天公。曾历千山万水, 几经花谢花开; 地道勤劳本色, 天然潇洒襟怀。

1945年9月3日, 日本投降, 11月毛泽东发表《沁园春·雪》, 身为国民党高官的崔敬伯先生第一时间在《新民晚报》上响应, 其特殊身份引起社会轰动, 在那个以诗言志的年代, 《沁园春·雪》的发表引起当时国共两党热闹非凡的论坛笔斗。

一夕风横, 八年血浴, 万里萍飘。看旌旗到处, 惟余榛莽; 衣冠重睹, 仍是滔滔。米共珠珠, 薪同桂贵, 早与天公共比高。抬望眼, 盼山河收复, 忍见妖娆。

名城依旧多骄, 引无数雄儿尽折腰。惜蒿里鹤衣, 无情点缀; 泥犁沟壑, 不解风骚。千载良时, 稍纵即逝, 岂是颓梁不可雕! 天醉也, 看今朝如此, 还看明朝!

抗战后期亦官亦学者, 同时还是多家知名报刊的专栏作者的多重身份让崔敬伯不堪重负, 几次病倒。抗战结束后, 1945年12月初崔敬伯先生坚辞了川康直接税局局长职务, 财政部部长俞鸿钧极力挽留, 继而在12月9日任命崔敬伯先生为财政部直接税署副署长。

1948年对国民党颇为失望的崔敬伯先生辞去财政部直接税署副署长职务, 参加国民政府立法院首次全民直选, 并于5月当选河北选区立法委员(独立候选人候选资格需3000人签名, 获至少60万选票)。在任期间多次提出“大力改革, 制止通货膨胀; 征课豪门资本, 实施临时财产税; 结束训政, 走向宪政”等主张。作为立法院中少数专家型立法委员, 多次参加蒋介石、李宗仁组织的茶话会。

1948年与历史组陈寅恪, 文学组胡适一同被民国两大研究机构之一的北平研究院评为财政学术会议会员(院士)(财政类学科在建国后被取消院士评选科目)。

1948年11月登报声明, 脱离立法院, 不再出席会议, 不再支领薪俸, 同时应李达、李祖荫、江之泳三教授电邀赴长沙湖南大学教书。

年初曾作诗一首《丑奴儿·辞岁》:

人间到处崎岖甚, 如此流年, 如此流年, 浊酒一杯洗足眠。

时间兀自无穷尽, 且看明年, 且看明年, 旋转乾坤别有天。

1949年作为最早的12名财经干部入选中央政府, 担任中央税务总局副局长。崔敬伯先生用半年的时间抑制了国民党后期的高度通货膨胀, 修正了税制, 参与起草了建国后第一部《新税法》, 确定了我国税制体系, 保证了新旧政权的顺利交接。

《水调歌头 财政与金融》

金融与时政, 相得而益彰。分配流通并重, 周转靠银行。太公九府圆法, 管仲弘羊心计, 平准古称扬。社会主义好, 领袖党中央!

重核算, 节成本, 建规章。钱如流水, 刘晏马上总思量。洪范五福先言富, 民富蔚成国富, 源远流留长。转亏增效益, 四化展辉光!

崔敬伯先生1949年任财政部中央税务总局副局长伊始, 同时着手新中国财经干部队伍和财经院校的建设, 作为财政部有丰富大学教学经验的学者型官员, 他始终关注华北税务学校(中央税务学校前身)的建设, 并于1950年亲自担任华北税务学校招生主任。1955年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特意嘱咐, 主要精力放在在院, 无论如何把财经教育抓好。1955年至1958年起兼任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副校长, 学术委员会主席, 主抓教学和科研。崔敬伯在任期间搭建了中财大的学术框架, 做了《关于周转税若干问题》、《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有关商品流通税、货物税问题》等报告。统一编写了教材, 《税务课程教学大纲》、《预算会计与分析教学》、《预算统一》、《工业会计》、《国家收入》、《国家预算》、《工业统计》、《统计学》, 制定了《教师每周工作计划执行情况表》、《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十二年工作规划》, 规划涉及学校的发展方向、规模、学制、专业设置、教学计划、科研与教材编写、教师进修、教学法、制度建立与健全、图书资料、干部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机构编制等方面。1958年起, 作为

专职教授后, 又开创了建国后大学里《中国财政史》这门学科的研究, 独自写出讲义和第二稿, 并于1979年在第二稿基础上和王子英一同出版了建国后第一部全国通用教材《中国财政简史》。

有诗《中国财政史第二稿独立完成》:
导师谆谆读历史, 戎章应研财政史。
忆苦至今永向前, 通晓前天与昨日。
国家存在要财政, 数千年来已如此。
封建王朝自废兴, 剥剝斑斑血成紫。
半封建建福烈烈, 敲鼓吸髓无止。
农民革命起复落, 三座大山压欲死。
共产健将揭红旗, 彻底翻身荡渣滓。
自此剥剝付灰尘, 人民财政从兹始。
长夜沉沉如垂梦, 红日当空近在尺。
光明黑暗两对照, 谁使吾民骏足驶!
苦尽甘来热泪盈, 回首前尘堪发指。
读史令人恨之至, 抚今方知爱之旨。
爱憎分明党性强, 不读历史吾之耻。
国史之中财政史, 生动教育盈此纸。

文革后先生已步入晚年, 仍忙于《中国历代食货志汇编简注》(上、中、下三册)、《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中国财政史》、《历代理财人物选记》、《工商税史长编》、《民国工商税史》等财政史料, 丛书和专著的指导、审校等出版工作。崔敬伯先生以自己渊博的学识不仅在30年代把西方财政经济思想传播到国内, 同时也在建国后把中国财经古文遗产, 历代财政思想家的财政思想、财政措施传承给了当代学者。我国有4000年历史, 史籍浩繁, 这些古代书籍没有标点, 又都是繁体字和财经专业词汇, 财经古文翻译、注释、点评工作难度极大, 工作量也巨大。没有这些史料的翻译工作, 现代学者是无法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崔敬伯先生在自己生命的晚年竭尽全力, 带领团队完成了这一艰巨的历史传承任务。

曾作诗《大力培养师资·七律》:

科技先行业革新, 加强教育涌新人。
红专并重资兴建, 富教兼施迓古今。
石田千顷无余地, 愚民百万是无民。
要求严格从中小, 培植师资教育殷。

崔敬伯先生虽然做过新旧政府的财政高官, 但一生没有购置房产, 所有收入, 稿费均用于购买书籍。做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时, 有一间办公室专门摆放他的书籍。当时苏联顾问很惊讶, 有些英文原版的书籍, 苏联也没有。建国后崔敬伯先生曾先后4次为中央财经大学捐书, 1966年一次, 1969年一次, 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有2次, 每次1000多册, 共计4000-5000册。这些捐赠的书籍中, 有很多珍贵的原版英文书和线装书。捐赠的书籍中除了财经专业书籍外, 崔敬伯先生的



崔敬伯先生90寿辰时, 与前来祝寿的朋友们交谈。